

語言接觸視角下中古漢譯佛經詞彙高度複音化的動因分析

——以《佛所行贊》為個案

邱 冰

北京語言大學

提要

中古時期是詞彙複音化承上啟下的關鍵階段。中古時期的佛經翻譯過程中，梵文原典對漢譯佛經詞匯的複音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使得佛經文獻表現出較強的複音化傾向。基於《佛所行贊》個案研究，本文從語言接觸視角考察了佛經文獻中高度複音化程度的原因，指出梵文原典語言的詞彙在漢譯過程中音譯或意譯形成了大量新的複音單純詞或複合詞，或者運用了漢語中現有的複合詞，導致了漢譯佛經詞彙複音化程度高於同時期的中土文獻。

關鍵詞

中古漢語，語言接觸，複音化，漢譯佛經，佛所行贊

1. 引言

詞彙複音化是漢語的重要發展趨勢，上古時期漢語以單音詞為主，近現代時期以複音詞為主，而中古時期則處於複音化進程承上啟下的關鍵階段。複音化是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重要標誌，漢語詞彙複音化進程在魏晉以前相對比較緩慢，進入中古時期以後，複音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在短短的二三百年中漢語詞彙系統以單音詞為主的面貌就得到了改觀（朱慶之 1992）。

漢語詞彙複音化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複音化發展趨勢的研究，即定性或定量考察各個歷史時期漢語複音詞的構造類型和比例，從歷時角度探討漢語詞彙複音化的發展規律。學界採用的方法主要是對選定材料中的複音詞進行窮盡性的分類統計，進而對複音詞的構造類型以及數量比例進行分析和比較，如程湘清（2003）、李仕春（2007）等。這些研究為漢語詞彙複音化的宏觀研究奠定了基礎。第二是漢語詞彙複音化產生原因的探討，主要有語音簡化說、表義說、義類義象分離說、韻律構詞說、外來語影響說等觀點（邱冰 2012）。漢語詞彙複音化是一種受到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複雜語言現象，上述觀點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緊密聯繫中古的時代特點，分析不同因素對中古漢語詞彙複音化的影響程度及其具體機制，仍需進一步的專題性研究，以更好地揭示處於關鍵過渡期的中古漢語詞彙複音化的動因。

隨著研究的不斷發展和深入，學者們已注意到中古時期漢譯佛經文獻的複音化程度要高於同時期的中土文獻。梁曉虹（1991）從詞形（不計詞頻）上進行考察，指出東漢王充的《論衡》共 21 萬字，其中雙音詞有 2300 個，而相近時期的元魏慧覺《賢愚經》總字數只有 14 萬餘字，卻含有雙音詞近 4200 個，因此他明確提出從一開始漢譯佛經中的雙音詞就比較多，而且隨著翻譯事業的發展，這種現象更為突出。邱冰（2012）則基於複音詞或單音詞的詞頻對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文獻進行了量化統計。僅就中土文獻而言，複音詞比重始終保持穩定而緩慢的發展狀態，呈現了一種緩慢而均勻上升的趨勢，即先秦的作品複音詞比重大體上在 35-40% 之間，西漢達到 40%，東漢在 42% 左右，南北朝在 45% 左右，而在中古時期，漢譯佛經文獻的複音詞比重一般在 50-60% 左右，明顯超過了中土文獻。上述數據從不同方面揭示了語言接觸可能對漢語詞彙複音化有重要的影響。

本文擬以《佛所行贊》作為個案，嘗試考察梵文原典詞彙對漢譯佛經文獻詞彙的高度複音化的影響，進而從語言接觸的視角探討漢譯佛經文獻詞彙高度複音化的動因。

2. 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

語言接觸從方式上可以分為自然接觸與非自然接觸兩類：自然接觸是指同一空間不同語言的相互接觸，而非自然接觸是指在不同空間通過文字傳播或文獻翻譯形成的間接接觸。漢譯佛經就是典型的基於文獻翻譯展開的非自然語言接觸的產物。

翻譯是將作品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和結果，其目的是通過在目的語中找到對等項來盡量準確地再現源頭語作品的語法和詞彙特徵。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為了宗教傳播的需要，以梵語為主的大量佛經文獻被譯為漢語。該翻譯過程受到了梵語與漢語在語言類型上的差別、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土傳統文化的差異、譯經者自身對梵漢語言的掌握水準的限制以及翻譯技巧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考察語言接觸過程中梵文原典語言對漢語產生的影響，就需要採用梵漢對勘的方法，即將漢譯本佛經文獻與梵文原典進行逐詞逐句的平行對比分析。目前已有一些學者採用梵漢對勘的方法，對漢譯佛經中的一些詞語進行了源頭考察和分析，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例如朱慶之（1998、2000、2002）、辛島靜志（2001、2002）、儲泰松（2002）、萬金川（2005）、朱冠明（2007、2008、2015）、俞理明、顧滿林（2008）等。

《佛所行贊》是採用梵漢對勘方法進行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理想語言材料。梵文《佛所行贊》（*Buddhacarita*）是公元 1 世紀古印度佛教哲學家和詩人馬鳴（*Aśvaghōṣa*）所作，是印度梵語文學史上第一部“大詩”（*Kāvya*），在南北朝時期傳譯到中國，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漢譯本《佛所行贊》詳細敘述了釋迦牟尼的生平經歷，詞彙豐富，並具有校勘精良的梵文原典，可以保證梵漢對勘研究的可靠性。

本文採取的具體對勘方法如下。第一、梵文《佛所行贊》全文都為偈頌，每句偈頌下依次對每個詞進行解釋，先標注出該詞的原形，然後標注出每個詞的語法信息。具體來說，以格為收尾的詞，依序列其性、格、數，英文解釋以及在《佛所行贊》中相應的漢譯。動詞變化依序列出其時態、人稱、數和語態，然後是該動詞的英文解釋以及相應的漢譯。第二、逐句給出每個偈頌完整的相應的漢譯。漢譯採用大正藏的版本，同時校勘了宋元明本和《中華大藏經》，不同之處依據梵文本進行了校訂。表1為一個完整偈頌的具體例子。

表1 《佛所行贊》的梵漢對勘示例

**tasmin vane śrīmati rājapatnī prasūtikālaṃ samavekṣamāṇā /
śayyāṃ vitānopahitāṃ prapede nārīśahasrair abhinandyamānā // 1.8 //**

tasmin(tad): n7s, in that 漢譯：爾時。

vane(vana): n7s, grove

śrīmati(śrīmat): adj n7s, beautiful, charming

rājapatnī(rāja-patnī): ctp6 f1s, the king's wife, 漢譯：摩耶后。

prasūtikālaṃ(prasūti-kāla): ctp6 m2s, the time of delivery, 漢譯：產時。

prasūti: f, generation,

kāla: m, time.

samavekṣamāṇā(sam-ava-√ ikṣ): prmp, f1s, perceiving, 漢譯：自知。

śayyāṃ(śayyā):f2s, bed, a couch, 漢譯：勝床。

vitānopahitāṃ(vitāna-upahitā): ctp3 f2s, overspread with an awning,

vitāna: m, awning

upahita(upa-hita): ppp, placed, put on

prapede(pra-√ pad): prf 3sa, approached, 漢譯：偃寢。

nārīśahasrair(nārī-sahasra): f3p, by thousands of women, 漢譯：百千婁女。

abhinandyamānā(abhi-√ nand): prpp, f1s, being welcomed, 漢譯：侍。

漢譯：爾時摩耶后，自知產時至，偃寢安勝床，百千婁女侍。

在此基礎上，本文將運用梵漢對勘的方法和材料，對《佛所行贊》進行研究，分析其中的複音詞與梵文原典之間的關係。

3. 梵語原典對漢譯佛經詞彙高度複音化的影響

來自西域的佛教文化與中土文化相互接觸，漢譯佛經大批湧現，承載外來文化的大量外來詞和新詞會相當集中地體現在漢譯佛經文獻中。在佛經翻譯的過程中，譯者

對梵文詞彙的翻譯主要採用音譯和意譯兩種方式。對於佛教術語、專有名詞等新概念、新事物的翻譯，較多採用了音譯的方法，即按照外語詞的聲音用漢語中音同或音近字對譯過來，因此音譯詞一般都帶有鮮明的外來異域色彩。意譯詞是拋棄了外語詞原有的語音形式，採用漢語的構詞材料，根據漢語的構詞方法而創造的新詞。由於意譯詞從形式上與本土詞語區別較小，容易被漢語所接受，進入到漢語自身的詞語系統中。由於佛教的廣泛傳播，佛教的部分概念已經逐漸滲透到中國社會和文化中，成為耳熟能詳的內容，因此很多意譯詞已經不再能明顯看出是來自外來文化，如“現在”“過去”“未來”等詞語。根據朱慶之（2001）的統計，意譯詞應該占到五分之四左右。

梵漢對勘材料顯示，採用音譯和意譯兩種方法翻譯出來的新詞，絕大部分都是雙音節甚至多音節的複音詞。

3.1. 《佛所行贊》中的音譯詞

《佛所行贊》中的人名、地名較多是採用音譯的方法，其中有 11 個是雙音節形式，29 個是三音節或以上，具體如表 2 所示：

表 2 《佛所行贊》中的音譯詞

音節數目	音譯詞	對應的梵文詞	《佛所行贊》用例
雙音節	車匿	Chandaka	慈目視車匿，猶清涼水洗。
	罽羅	Aḍa	罽羅月光孫，亦由我此箭。
	瞿曇	Gautama	長苦行瞿曇，亦為天后壞。
	羅摩	Rāma	今於空野中，棄捐太子歸，則同須曼提，棄舍于羅摩。
	魔菟	Manu	魔菟眾生主，亦當為子憂。
	農沙	Nahuṣa	農沙修苦行，王三十三天。
	毘求	Bhṛigu	毘求央耆羅，此二仙人族。
	求那	Guṇa	是故有求那，當知非解脫。
	求尼	Guṇin	如是求那前，亦無有求尼。
	舍脂	Śaśī	王如天帝釋，夫人猶舍脂。
	孫陶	Sunda	孫陶鉢孫陶，阿修輪兄弟，同生相愛念，為欲相殘殺。

三音節	阿低離	Ātreya	後生阿低離，善能治百病。
	阿羅藍	Arāḍa	彼有大牟尼，名曰阿羅藍。
	阿私陀	Asita	時近處園中，有苦行仙人，名曰阿私陀，善解於相法。
	波屍吒	Vaśiṣṭha	如安低牒王，奉事波屍吒。
	鉢孫陶	Upasunda	孫陶鉢孫陶，阿修輪兄弟，同生相愛念，為欲相殘殺。
	闍延多	Jayanta	王如天帝釋，子如闍延多。
	迦毗羅	Kapila	遺失救世主，還歸迦毗羅。
	瞿曇彌	Gautamī	瞿曇彌長養，乳哺形枯乾。
	羅睺羅	Rāhula	年並漸長大，孕生羅睺羅。
	孫陀利	Sundarī	古昔孫陀利，能壞大仙人。
	頭樓摩	Druma	娑樓婆國王，名曰頭樓摩。
	毗梨多	Vṛtra	此城失威德，如殺毘梨多。
	修迦羅	Śukra	毘利訶鉢低，及與修迦羅，能造帝王論，不從先族來。
	須曼提	Sumitra	今於空野中，棄捐太子歸，則同須曼提，棄舍于羅摩。
	央耆羅	Aṅgiras	毘求央耆羅，此二仙人族。
優陀夷	Udāyin	有婆羅門子，名曰優陀夷。	
三 / 四音節	耶輸陀 / 耶輸陀羅	Yaśodharā	容姿端正女，名耶輸陀羅。時耶輸陀羅，深責車匿言。
四音節	波闍波提	Prajāpati	彼迦毘羅者，今波闍波提。
	富那婆藪	Punarvasu	如富那婆藪，兩星侍月傍。
	迦賓闍羅	Kapiñjalāda	婆羅舍仙人，與迦賓闍羅。
	彌伽迦利	Megha-kālī	魔王有姊妹，名彌伽迦利。
	摩醯首羅	Śiva	如摩醯首羅，忽生六面子。
	那羅鳩婆	Nalakūbara	毘沙門天王，生那羅鳩婆。
	悉達羅他	Sarvārthasiddha	以備眾德義，名悉達羅他。
五音節	彌鄰利檀茶	Mekhala-Daṇḍakas	彌鄰利檀茶，如屠家刀機。
	難陀婆羅闍	Nandabalā	難陀婆羅闍，歡喜到其所。
	毗梨訶鉢低	Bṛihaspati	若能止住此，奉事如帝釋，亦如天奉事，毘梨訶鉢低。
	毘陀波羅沙	Vṛddha Parāśara	毘陀波羅沙，及餘求道者，悉從於此道，而得真解脫。
	舍那鳩摩羅	Sanatkumāra	猶梵天長子，舍那鳩摩羅。

《佛所行贊》中還有一些採用了半音譯半意譯的方式，這些詞也都是複音詞。舉例如下，例中僅給出《佛所行贊》詞語出處對應的品。

曼陀羅花：“散曼陀羅花，專心樂供養。”（《生品》）

與“曼陀羅花”對應的梵文為 *mandāra-puṣpa*，“曼陀羅”為 *mandāra* 的音譯形式，“花”為 *puṣpa* 的意譯形式，梵文 *puṣpa* 為中性名詞，義為“花朵”（*flower*）。

娑樓婆國王：“娑樓婆國王，名曰頭樓摩。”（《推求太子品》）

與“娑樓婆國王”對應的梵文為 *sālva-adhipati*，“娑樓婆”為 *sālva* 的音譯形式，“國王”為 *adhipati* 的意譯形式，梵文 *adhipati* 為陽性名詞，義為“國王”（*ruler*、*king*）。

3.2. 《佛所行贊》中的意譯詞

《佛所行贊》是用標準的古典梵文寫成的，古典梵文中存在大量的複合詞，對勘材料表明譯者將《佛所行贊》翻譯成漢語的過程中，大都把梵文中的複合詞採用意譯的方式翻譯為相應的漢語雙音複合詞形式。複合詞是漢語本身最為能產的構詞方式，將梵文複合詞翻譯成相應的漢語雙音複合詞，是一種自然而且有效的翻譯方法，因為譯者只需要使用漢語中已有的語言材料，去逐一對譯梵語複合詞中的每個構成成分，即可由梵文複合詞自然地翻譯為漢語的雙音複合詞。這樣的翻譯方法使得梵文複合詞和漢語雙音複合詞在內容和形式上都保持了良好的對等性。譯者將《佛所行贊》中的複合詞意譯為相應的漢語雙音複合詞的時候，存在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如果漢語中沒有現成相對應的雙音詞，或者限於譯者的翻譯水準，不知道應該如何表達，譯者就會使用漢語的材料將梵文複合詞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逐一翻譯出來，這些詞語往往是佛經譯者自己新造的，因此產生大量新的複音詞。

二生：“二生駒屍仙，不閑外道論。”（《生品》）

其中“二生”指的就是印度社會中的再生族。古印度有再生族和一生族的說法，再生族是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這三個階級，首陀羅是一生族。根據婆羅門教義，只有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這三個階級有資格接受洗禮，學習婆羅門教典吠陀文獻，有權拜神，因為有這個權力，所以婆羅門教可以給這三個階級以第二次生命，這個就叫做再生族。與“二生”對應的梵文為 *dvi-jatva* 一詞，該梵文詞的前半部分 *dvi* 為數詞“二”，中間部分 *jatva* 意思是“出生的”（*born*），譯者將其翻譯為“二生”。

淨飯：“甘蔗之苗裔，釋迦無勝王，淨財德純備，故名曰淨飯。”（《生品》）

“淨飯”為佛陀生父的名字。與“淨飯”對應的梵文為 *Śuddha-odana*，前半部分 *Śuddha* 為形容詞，義為“乾淨的”“純潔的”（*pure*），後半部分 *odana* 為名詞，意思是“粥”“飯”（*porridge*、*boiled rice*）。譯者將整個梵文複合詞翻譯為“淨飯”。

苦海：“眾生沒苦海，令得解脫故。”（《生品》）

與“苦海”對應的梵文為 *duḥkha-arṇava*，梵文的前半部分 *duḥkha* 為中性名詞，義為“痛苦”（*pain*、*sorrow*），後半部分 *arṇava* 為中性名詞，義為“大海”（*sea*、*ocean*）。譯者將其翻譯為“苦海”，泛指各種苦難世界，這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即“苦無際限，譬之以海也”。

法雨：“興發大悲雲，法雨雨令滅。”（《生品》）

與“法雨”對應的梵文為 *dharma-vṛṣṭi*，前半部分 *dharma* 為陽性名詞，表示“法”，後半部分 *vṛṣṭi* 為陰性名詞，義為“雨水”（*rain*），譯者翻譯為“法雨”。這是一個持業釋複合詞，法即雨，雨即法，以雨來比喻佛之教法。佛法滋潤眾生，令由迷妄而至證悟，猶如雨之普澤草木，使其生長，而至開花結果，故以雨譬喻之。

法王：“法王出世間，能解眾生縛。”（《生品》）

與“法王”對應的梵文為 *dharma-rāja*，前半部分 *dharma* 為陽性名詞，譯者翻譯為“法”，後半部分為陽性名詞 *rāja*，義為“國王”。譯者將整個複合詞翻譯為“法王”。

恒水：“恒水沐浴身，法水澡其心，祈福非存己，唯子及萬民。”（《生品》）

“恒水”一詞在中土文獻中未見。梵文《佛所行贊》中與該詞對應的梵文複合詞為 *tīrtha-ambu*，前半部分 *tīrtha* 為中性名詞，在這裡表神聖河流岸邊朝聖的地方（*place of pilgrimage on the banks of sacred streams*），在印度文化中指的就是恒河，因此譯者將之翻譯為“恒”。*ambu* 為中性名詞，義為“水”（*water*），因此複合詞 *tīrtha-ambu* 被翻譯為雙音形式的“恒水”。

燈明：“自身光照耀，如日奪燈明，菩薩真金身，普照亦如是。”（《生品》）

“燈明”一詞未見於上古和中古時期的中土文獻。該詞對應的梵文複合詞是 *dīpa-prabhā*，該複合詞的前半部分 *dīpa* 為陽性名詞，義為“燈”（*lamp*、*light*），後半部分 *prabhā* 為陰性名詞，義為“光線”（*splendor*、*radiance*）。整個複合詞 *dīpa-prabhā* 就是“燈光”的意思。譯者對應梵文複合詞的每一個部分，將其翻譯為雙音形式的“燈明”。

十車：“失子心躁亂，如昔十車王。”（《合宮憂悲品》）

“十車”為國王名字。據《羅摩衍那》的記載，古印度有兩個國家，東邊的 Kosala 與西邊的 Videha，其中 Kosala 國王的名字就叫做“十車王”。與“十車”對應的梵文為 Daśa-ratha，複合詞的前半部分 daśa 為數詞，表示“十”的意思。後半部分 ratha 為陽性名詞，表示“車子”的意思。譯者將整個梵文複合詞翻譯為“十車”。

法怨：“鬼龍諸天眾，悉皆大歡喜，法怨魔天王，獨憂而不悅。”（《破魔品》）

“法怨”一詞未見於上古和中土時期的中土文獻。與該詞對應的梵文複合詞為 saddharma-ripu，前半部分為陽性名詞“法”，後半部分 ripu 為陽性名詞，義為“敵人”“怨敵”（enemy、foe），複合詞 saddharma-ripu 表示“法之敵人”的意思，譯者翻譯為雙音形式的“法怨”。

第二，如果漢語詞彙系統中已經存在對應的雙音詞，譯者就會直接拿來使用。

日道：“我從日道來，聞空中天說，言王生太子，當成正覺道。”（《生品》）

“日道”最早見於漢王充《論衡·說日》“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日道”一詞在中古中土文獻中並不多見，就筆者調查僅見於《論衡》。梵文《佛所行贊》中與“日道”對應的梵文複合詞是 āditya-patha，其前半部分 āditya 為陽性名詞，義為“太陽”（sun），後半部分 patha 為陽性名詞，義為“道路”（path），整體複合詞表示“太陽運行的軌道”（the path of sun），譯者仿照複合詞的內部形式將其翻譯為漢語雙音複合詞“日道”。

王子：“王子世所愛，舉國人之命。汝輒盜將去，今為何所在？”（《合宮憂悲品》）

“王子”一詞，最早見於《書·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該詞在中土文獻中亦常見，如《左傳·成公二年》：“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屍以求之。”《國語·周語上》：“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對而怒乎！”梵文《佛所行贊》中與“王子”對應的梵文複合詞是 rāja-putra，複合詞的前半部分 rāja 為陽性名詞，義為“國王”（king），後半部分 putra 為陽性名詞，義為“兒子”（son）。整個梵文複合詞 rāja-suta 的意思即為“國王子子”，譯者對照複合詞中的每個部分，將其逐一翻譯為相應雙音形式的“王子”。

禽獸：“及種種禽獸，無欲使爾者。”（《推求太子品》）

“禽獸”一詞最早見於《孟子·滕文公上》：“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該詞在中土文獻中較常見，如《荀子·勸學》：“草木疇生，禽獸群居，物各從其類也。”梵文《佛所行贊》中與“禽獸”對應的梵文複合詞是 *mṛga-pakṣi*，複合詞的前半部分 *mṛga* 為陽性名詞，義為“野獸”（wild beast），後半部分 *pakṣi* 為陽性名詞，義為“鳥”“禽”（bird），複合詞的前後兩個部分是一種並列的關係，整個梵文複合詞義為“野獸和鳥”，按照梵文複合詞的順序直譯即為“獸禽”，此處譯者採用了漢語中已有的雙音複合詞的形式，將其翻譯為“禽獸”。

4. 結語

中古時期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中國，湧現出大量的佛經文獻。佛經文獻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較強的複音化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佛經文獻的異質性所導致的。內容上，佛經作為一種全新的體系傳播進來，承載的是印度佛教文化；語言上，佛經原典語言以梵文為主，梵語漢語兩種語言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類型差異，在佛經翻譯過程中原典對漢譯本詞匯的複音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基於《佛所行贊》這一個案，本文從語言接觸視角考察了佛經文獻中詞彙複音化程度更高的原因。在佛經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對梵文詞彙的翻譯主要採用音譯和意譯兩種方式。梵漢對勘材料顯示，採用音譯方法翻譯出來的新詞，主要是外來的人名、地名等，絕大部分漢譯為雙音節甚至多音節的複音詞。同時，古典梵文中存在有大量的複合詞，對勘材料表明譯者將《佛所行贊》翻譯成漢語的過程中，大都把梵文中的複合詞採用意譯的方式翻譯為相應的漢語雙音複合詞形式。譯者大量使用已有的複音詞或者創造新的複音詞，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複音詞的使用頻率不斷提高，後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複音詞的數量有所增加，這兩個方面都會導致漢譯佛經複音詞的比重增大，使得佛經文獻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較強的複音化傾向，遠高於同時期的中土文獻。

鳴謝

本文得到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基於梵漢對勘的《佛所行贊》新詞新義研究”（項目編號：17YYC019）、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青年拔尖人才等基金項目的資助。《中國語文通訊》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參考文獻

- 程湘清。2003。《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儲泰松。2002。“和尚”的語源及其形義的演變。《語言研究》第1期，頁83-90。
- 李仕春。2007。從複音詞數據看中古漢語構詞法的發展。《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3期，頁1-7。
- 梁曉虹。1991。漢魏六朝對漢語詞匯雙音化的影響。《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73-78。



- 邱冰。2012。《中古漢語詞匯複音化的多視角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萬金川。2005。《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佛經語言學論集》。南投：正觀出版社。
- 辛島靜志。2001。《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究——《道行般若經》與異譯及梵本對比研究。《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頁313-327。
- 辛島靜志。2002。《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究——《道行般若經》中的難詞。《漢語史研究集刊》第5輯，頁199-212。
- 俞理明、顧滿林。2008。東漢佛經中的“香”和“臭”。《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1輯，頁297-307。
- 朱冠明。2007。從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中國語文》第5期，頁402-411、479。
- 朱冠明。2008。移植：佛經翻譯影響漢語詞匯的一種方式。《語言學論叢》第37輯，頁169-182。
- 朱冠明。2015。佛經翻譯中的詞義移植補例。《語言研究》第4期，頁107-111。
- 朱慶之。1992。試論佛典翻譯對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若干影響。《中國語文》第4期，頁297-305。
- 朱慶之。1998。佛教漢語的“時”和“時時”。《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輯，頁166-175。
- 朱慶之。2000。佛經翻譯中的仿譯及其對漢語詞匯的影響。《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1輯，頁247-262。
- 朱慶之。2001。佛教混合漢語初論。《語言學論叢》第24輯，頁1-33。
- 朱慶之。2002。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收錄於《華林》編輯委員會編：《華林》（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頁27-46。

Motivation of the High Polysyllabl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s of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Taking *Buddhacarita* as a Case

Bing Qiu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iddle Ages is the key stage of the polysyllablization for Chinese. In the procedure of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Sanskrit literary works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polysyllabliz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s, making the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show a strong polysyllable tendency.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Buddhacarita*, we will examine the reasons of the high degree of polysyllablization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point out that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polysyllabic words in the Sanskrit original language that would affect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the corresponding Chinese words, either increasing the usage of existing polysyllabic words or creating new polysyllabic words, which had led to the higher proportion of Chinese-translating Buddhist sutras than that of the Chinese native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Keywords

middle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polysyllabliza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Buddhacarita*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語言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部

電郵地址：sukhii@163.com

收稿日期：2018年5月15日

接受日期：2018年12月28日